

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

□ 赵璐璐

民本思想的形成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起源于殷周之际。殷商时期，中国人处于原始的自然崇拜逐步向多种崇拜转变的时期，人们祭天地、星辰、日月，祭鬼神，此时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最高的是太阳神。到了西周，周人把“天”奉为有意志的人格化的至上神，并且将其与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因此周王称“天子”，是受了“天命”来统治天下的。另一方面，周人又从商的覆灭中认识到“天命靡常”，看到了人民的武装倒戈，才使西周打败了商王朝，体会到《尚书》中所讲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从而对“天”与人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继而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开启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先河。

春秋时期，周王室日益衰败，礼乐崩坏，原来维系着周王朝统治的封建制、宗法制纷纷崩溃，对于“天”的崇拜也随之产生动摇。另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对人本身能力和地位的肯定使得民本思想进一步变化，更加强调人在天人关系中的作用。因此，有了荀子提出的“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突出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消解了“天”的神圣性。与此同时，各国并立、群雄争霸的局面，也让一部分君主和大臣对“民”的认识发生转变，感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在统治实践中加强了对民众作用的理解。在春秋战国历史发展和思想争鸣过程中，从孔子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爱民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至此真正形成了。

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出现，消解了“天”、天命的神圣性，使得中华文明走向了不同于西方传统“君权神授”的另一种发展道路，也使得关注民生、注重人民的作用在中国传统治国理政当中居于显著的地位，构成了中国文化特色之一。

民本思想的发展及其实践

民本思想在秦朝建立以及汉朝兴起的历史发展中，成为儒家和法家融合的重要衔接之处，也对皇帝权力起到了部分的限制作用。到了唐朝初年，君民关系更是成为贞观时期重要

的一个理论问题，推动了唐朝政治文明的进步。

唐朝初年政治思想的核心可以用“国以民为本”或“国以人为本”来概括。《荀子·王制篇》中讲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说的是作为君主，老百姓可以扶持你，也可以颠覆你、推翻你，表现出君主和老百姓的关系是一种依存的关系。唐太宗和贞观时期的大臣也都引用过这句话。因此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大家就是这样来理解唐太宗君臣对于君民关系的认识。

但是，以唐太宗为首的贞观君臣没有停留在这样的认识水平上，他们的看法在原有的民本思想上更加深入。首先是明确提出了“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贞观政要》卷八《务农第三十》云：“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王珪更进一步提出，“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国以民为本的核心问题是衣食问题在古代早已提出。《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讲：“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淮南子·主术训》也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而贞观君臣的这些话却抛开了仁义道德的外衣，简单明确地说明了一条最根本的道理：对百姓的征发超过了一定的限度，老百姓无法活下去、无法忍受，就会起来造反。做皇帝必须使老百姓能够生存下去，统治者能够统治下去的条件是必须使被统治者有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古今许多统治者所不懂的，特别是王朝末年的统治者所不懂的。历史上大多数王朝的覆灭，都是因为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而老百姓所以活不下去，就是因为统治者忘记了怎样进行统治这一条基本原则。不少新王朝的创业者都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像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大臣们这样总结历史教训，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来，则是第一次。

其次是唐太宗进一步提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自古以来关于君权无非是两点：一是君权神授；二是家天下，西汉初年窦婴说：“天下者，高祖天下。”申屠嘉也说：“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随着东汉末年皇权衰落，也出现了相反的理论

其中第一品格，是最硬的硬核。

人民众志成城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立场。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在常态化的国家治理过程中有鲜明优势，在应对风险危机突发事件中更会激发出磅礴的力量。近一段时间来的实践表明，抗击疫情为了人民，抗击疫情更要依靠人民。只要全民行动起来，就一定能打赢这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在这场人民战争中，从城市到乡村，从内陆到边疆，14亿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与病魔展开搏击。广大人民群众响应党中央号召，自觉听从疫情防控安排，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凝聚起来，从自己做起、从点滴做起，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全国构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

疫情让中国人民更加深刻认识到命运共同体的深切含义，也更加自觉意识到作为历史主体团结奋进的使命担当。我们在微信上看到一句很好的话：“疫情让人们在空间上保持距离，却让人们在心灵上贴得更近。”

不论是武汉人、湖北人还是他乡他地人，都是一家人，家人有难，大家共同搭把手；不论是医护人员、正在加班加点的工厂工人还是春节在家休息的居民，都是战斗者，捐口罩、送外卖、发信息、鼓士气，用各自的方式与病毒斗争。“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昔日，众志成城

论和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国时期魏李萧远《运命论》中所提出的：“故古之王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隋朝建立后，随着皇帝在整个政治体制中地位的变化，李萧远的观点又被重新提起。隋炀帝继位以后，在营建东都的诏书中写道，“是知非以天下奉一人，乃以一人主天下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从文字上来说虽然是李萧远《运命论》的翻版，但是“以一人治天下”，改变为“以一人主天下”。从一人治理天下改变为一人主持天下，皇帝从一个专制的君主变成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虽然这只是一字之变，但是这一字之变，却反映了皇帝在政治体制中地位的变化。

贞观六年，唐太宗在和大臣的谈话中在把这个问题进一步推向前进。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接下来魏征就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唐太宗和魏征的这次对话可以看作是贞观君臣对于君权理论讨论的总结。唐太宗以皇帝的身份提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明确提出了天子是民推而为主，而且可以弃而不用，强调皇帝与民不仅是依存关系，而且是举用的关系，皇帝的权力来源于民。这就否定了皇帝受命于天的观点，否定了皇帝及其权力与天的联系，同时也把中国古代君权的理论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唐太宗还提出“君人者以天下为公”，并且明确提出：“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上天、下惧群臣……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就是上不负天，下不负民。天是抽象的，民是具体的，把爱民放在很突出的地位。魏征和王珪也反复强调皇帝要“以百姓之心为心”。

贞观初年，唐太宗君臣把百姓之心和百姓利益作为政务处理的出发点，突出以民为本，关心民生这个主题，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有密切关系的。一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一般地主的兴起。二是隋朝末年在浩繁的工役和连年战争中的农民，他们以生命的代价唤醒了贞观统治者的良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以民为本，关心民生，这样一些政治理念，是建立在新的君权理论，以及历朝特别是隋朝的兴亡教训基础之上的。

与此同时，贞观君臣还将对民本思想、君民关系的理论探讨付诸于制

的中国人民能战胜外侮书写辉煌历史；今天，众志成城的中国人民也一定能战胜疫情走向美好明天。

人民群众更是抗疫新风尚的践行者。春节本是中国社会分享一年收获、人们走到一起欢聚一堂的日子，但是为了防控疫情，不再走亲访友、没有庙会不办宴，千百年来的风俗说放手就能放手；走向全面小康的中国人利用春节假期游览大好河山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但是为了防控疫情，不再旅游度假、不再驾车兜风，大人孩子一夜之间变成了不出门的“宅男宅女”；人们在调侃中享受着延长的假期，在微信上晒晒美食、发发表情，用微笑告诉自己也告诉世界，恐慌与悲观从来不是中国人民的情绪。有这样坚强、理性、乐观的中国人民，还有什么危难不能跨越。

坚定依法防控

法治是实现现代国家治理最基本的方式，也是最可靠的方式，在常态时期是如此，在非常时期更是如此。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2月5日召开了第三次会议，传递出了极为明确的信号，宣示了依法防控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方面的显著优势已经和正在充分体现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

依法防控核心是充分运用法治来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抗击疫情既不能为情绪所左右，更不能被恐慌所主导。对疫情状况的知情权是人民

度实践，把国运昌明的治国目标建立在重视民生的基础上。《旧唐书》记载了贞观时期五覆奏制度的由来，“初，河内人李孝德，素有风疾，而语涉妄妖。蕴自究其狱，称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蕴自家住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奏事不实。太宗大怒，曰：‘小子乃敢乱吾法耶？’令斩于东市。太宗寻悔，因发制，凡决死者，命所司五覆奏，自蕴始也。”唐太宗因为权万纪的告发，杀死了认为一名叫李孝德的嫌疑人无罪的官员张蕴古，事后唐太宗非常后悔，于是确立死刑五覆奏制度。贞观五年（631年）十二月初二，唐太宗下令“自今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宣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也就是在京师地区行刑要五次覆奏，在地方州县行刑要三次复奏。覆奏速度不能太快，必须隔天进行，五覆奏行刑前一天复奏两次，当天覆奏三次；三覆奏行刑前一天覆奏一次，当天覆奏两次。核心目的就是要慎罚恤刑，使得执法者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是否必须判处死刑，对人的生命给予最大的尊重。

因此，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朝国力的兴盛，与贞观年间对于民本问题的理论探讨与制度实践可说是密不可分的。

民本思想的镜鉴意义

明末清初，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以及新的经济形态的萌芽，民本思想得到极大发挥。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思想家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黄宗羲指责君主制度是“天下之大害”，反对君主把天下当作私产，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应该“以天下万民为事”，“天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从而试图突破民本思想中君主的主体地位，打破其中的恩泽色彩。所以，民本思想也成为近代中国人接受民主思想的一条勾连古今的途径，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当然，民本思想究其本质与民主是不同的，也自然与今天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具有根本差异。但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对国家和人民关系的理解，以及在古代国家治理当中的实践作用对当下仍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中国古代治理思想

群众的基本权利，一定要依法做好疫情报告和发布工作，按照法定内容、程序、方式、时限及时准确报告疫情信息，不晚报、不瞒报；同时也要依法打击各种各样造谣传谣的行为，防止造成社会恐慌。及时恢复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市场主体的基本权利，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的根本途径，既要依法鼓励各个市场主体积极进行生产，也要依法查处不满足开工条件、没有有效防护措施的生产行为，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疫情哄抬物价、囤积居奇、趁火打劫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违法犯罪行为。

非常时期客观需要非常手段。非常手段来自“事急从权”，更是来自法律法规的有效授权。不论是对武汉的应急“封城”举措还是对各地流动人口的严格防控措施，背后矗立的都是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法律法规，体现的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基本原则、基本精神。既没有因为疫情事发突然、应急刻不容缓而放开了权力的法治笼子，让权力处于法治之上、法治之外，也没有拘泥于常态化背景下法律的繁文缛节而绑住了行政机关必需的自由裁量权，影响遏制疫情的有效作为。司法机关明确提出，对于危害疫情防控、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依法从严从重把握。这正是在非常时期更好发挥法治力量、充分体现法治精神的法治举措。

踏破关山千万重，迎来霞光浣征袍。坚定依托制度优势，我们已经做得很好，打响了疫情防控阻击战；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真正取得战胜疫情的最后胜利。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疫，民皆疾也。”瘟疫自古就是一个社会难题，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战“疫”的记载。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统计，历史上有详细描述“大疫”，周代有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殁，或覆族而丧。”对于中国历代的执政者，每一次疫情的发生，都是一次关乎生死存亡的大考。在这一次次的战“疫”“大考”中，中国人顽强抗争，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良方。

隔离方

李兰娟院士指出，隔离病人、控制传染源是最好的防疫方式之一。这是有历史依据的。能否迅速控制疫情，主要就在于地方官能否在第一时间发现疾疫并飞快地采取隔离措施、保护百姓。《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记录了秦代的战“疫”制度，平时由典甲（乡长）负责留心调查，一旦发现疑似病例，立刻向郡守报告；郡守接报后，马上派出医官进行检查，一旦属实，当即组织隔离治疗。所有的病例被隔离在专门的“病所”里，由政府派专人医治和照顾，病愈之前不得与外界接触。这就是中国设立隔离治疗制度的开始。汉代不但延续了秦制中的“病所”，还设有专门的军中隔离医院——“廕庐”。据《后汉书》记载：汉军讨伐羌人时，“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为避免疫情扩大，所有染疫的官兵被统一安置在“廕庐”里，由专人留下来负责隔离治疗。

南朝设“六疾观”，北朝设“别坊”。唐朝设“病坊”，由佛教寺院负责承办。宋代设“安乐坊”，后又更名为“安济坊”。由中央政府视疫情分拨经费，由地方政府采购药物，招募僧人照料病患。“安济坊亦募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所治瘥人，岁终考其数为殿最。”宋代的隔离医院里不但有病房、医生，还有记录病情的“手历”，并有依据“手历”进行表彰、奖励的年终考核制度。“安济坊”中，病人以病情轻重分区居住，“以防渐染”。明清时期承袭其制，设“养济院”。

另一种隔离方，是把健康人主动从疫病中隔离开来。政府鼓励在疫区的居民深居简出，甚至足不出户，以待疫情消解。对抗疫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摄生者，惟静坐简出，足以当之”。《不知医必要·时疫》云：“若一人之病，染及一室，一室之病，染及一乡，以及闾邑，病气秽气，互相传染，其气从口鼻而入。”从历史的经验看，我们现在尽量少外出、不聚集，这是经过历史检验的最有效、最安全的战“疫”良方。

医药方

无论哪个朝代，由政府组织医疗力量迅速救治，都是战“疫”决胜的重中之重。淳熙十四年，临安发生瘟疫，宋孝宗令和剂局研制防疫汤药，免费分发给百姓；正统十四年，淮扬发生瘟疫，明英宗派40多个太医奔赴疫区，划片分人负责，带领并指导当地医生救治百姓；嘉靖二十年，京城暴发“疫病”，明世宗亲自研制《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司，遵用济民”，并令官员向民间印发药方；万历十五年，京城大疫，明神宗从太医院调出大量医生，在北京及周边免费诊治并施药。不仅要“医救”“赐药”，还要“颂方”，这是中国古代政府面对疫情时所必须承担的任务。

从南北朝时期起，政府便承担征集、实验与发放药方的任务。北宋朝廷收集编订的《集验方》《简要济众方》《庆历善救方》《圣惠方》《四时摄生论》等方集在战“疫”斗争中立了大功。不少有作为的地方官也积极组织编写实用方书。如度州知州刘彝撰《度州正俗方》、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撰《陈氏集验方》、信阳军知军王寔撰《伤寒证治》等。

这些名方凝结着历代名医的经验与智慧，千年后的今天用之仍有奇效。如余师愚所发明的清瘟败毒散，能治疾疫之恶寒发热、头痛如劈、烦躁谵妄、身热肢冷，有起死回生之功。广东名医梁玉璠所用的家传验方十全苦寒救补汤治疗，十日之内，必收奇效。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如白虎汤，临床常用于治疗感染性疾，如大叶性肺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等；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主治症状是风热袭肺，或风寒郁而化热，

历史上的战『疫』良方

□ 邓田田

壅遏于肺。博大精深的中医学，是我们今天仍需参考的智慧宝库。

除污方

疫从何来？中国人早就认识到：疫从污起。脏乱差的环境、被污染的河流，容易滋生并散播瘟疫。

为消除污染源的隐患，历代战“疫”的地方官都在环境整治上下足了功夫。乾道二年，隆兴府大疫。隆兴城旧，供水的河渠豫章沟里积满污泥、臭气熏天。知府吴鼎率众疏浚河渠，禁绝污染，又把百姓迁居到离河渠较远的干爽洁净的高地，“集群医分井治疗，贫者食之，全活不可计”。

宋神宗年间，度州瘟疫频发，知州刘彝认为祸根在于水源上游淤塞，以致屢生水患、滋生疾疫。便以“雨污分离”的新思路设计并修建了著名的“福寿沟”，利用地形的高差，采取自然流向的办法，将坡度、断面设计得十分精巧，又依据水力学原理在出水口“造水窗十二，视水消长而后闭之”，以防江水倒灌。度州的瘟疫从此消失殆尽。福寿沟至今仍满足着赣州旧城区的排污需求。即使再增加三四倍的雨水、污水流量，也不会发生内涝。

清洁方

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蒸汽可以消毒，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指出：“天行瘟疫。取出病人衣服，可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除了蒸汽，熏燃也是战“疫”的妙计。芸香气味芬芳，置于席下则蚊虫不生；艾草香气清爽，燃烧艾叶则蚊虫退避。南宋时期，临安县里有很多卖“蚊烟”的小商贩，卖的就是干艾草压制成的香饼。另外，宋人还有一种专门用来熏燃的驱虫药，由木鳖、雄黄、艾草和合，效果很好，有诗为证：“木鳖芳香分两铤，雄黄少许也须称，每到黄昏烧一柱，安床高枕至天明”。

个人必须要高度重视，以保持健康，增强战“疫”的免疫力。《增补瘟疫论》曰：“有温病而未病者，存于肢理鼻喉之间，温者清之；否，冬必伤于寒……”不仅要勤洗手、口，而且要每日沐浴，衣服要保持洁净、干爽，冷热适度。盥洗不能仅用清水，还需附以澡豆、皂角的帮助。澡豆是一种用黄豆粉混合杀菌药粉制成的小丸，用以清洁面、手，《遂昌杂录》记载：“宋僧温日观……每索汤浴，鲜于公必躬为进澡豆”，可见澡豆是当时洗沐的必备品。此外，宋人还有吃饭、赏花、祭祖之前必须认真洗手的习惯，南宋人所画的《盥手观花图》正是这一良俗的生动写照。

息疫方殊庆，丰年已报祥。面对险恶的疫情，即使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古代，顽强智慧的中国人民都能不断战胜疫魔。今天，我们更应该坚定信心，奋力夺取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全面胜利。